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6 冊

孫詒讓《名原》研究

葉純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孫詒讓《名原》研究／葉純芳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2+182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編：第 26 冊）

ISBN：978-986-6831-23-2（全套精裝）

ISBN：978-986-6831-22-5（精裝）

1.（清）孫詒讓－學術思想－文字學

2.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與考訂

802.2

96004481

ISBN - 9866831225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 編 第二六冊

ISBN：978-986-6831-22-5

孫詒讓《名原》研究

作 者 葉純芳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葉純芳，台灣臺北市人，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生，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國際漢學論叢》編輯。專研經學。著有《孫詒讓「名原」研究》（碩士論文）、《孫詒讓「周禮」學研究》（博士論文）；撰有〈海峽兩岸點校「史部」古籍的回顧與檢討〉（合撰）、〈魏晉經學的定位問題〉、〈乾嘉學者研治《周禮》的貢獻〉、〈孫詒讓的輯佚成果——《周禮三家佚注》〉、〈《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周禮部》的文獻價值〉等學術論文十餘篇；編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共同編輯）、《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共同編輯）等書。

提 要

清代是古文字研究的鼎盛期，乾、嘉時期，金文著錄的著作不論是官方的、民間的，在歷代著錄金文的書籍中成為成績最豐富的時代；到了晚清，甲骨文的發現，更提供古文字學家一片亟待開發的良田。而窮畢生心力在古文字學研究上的學者，首推晚清的孫詒讓。孫詒讓窮四十多年的時間在研究青銅器銘文上，先後著有《古籀拾遺》、《古籀餘論》。這兩部書可以說是清代金文研究著作的總結。西元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河南安陽發現甲骨卜辭，在短短的五年之中，劉鶚即編成《鐵雲藏龜》一書，以著錄甲骨拓片為主，也嘗試解釋幾個甲骨文字。次年，孫詒讓便根據《鐵雲藏龜》寫了《契文舉例》，這是第一部甲骨文研究的著作。孫詒讓晚年，寫了《名原》一書，這部書雖然是孫詒讓最後一部古文字學的著作，卻是中國古文字學史上第一部綜合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古文字資料而成的著作，它所代表的意義，是正式結束歷代以「著錄金文並考釋文字」，亦即「以一器釋一器之文」的研究型態，而純粹以討論古文字字形為主的專著。《名原》雖然在古文字學史上扮演著承先啟後的地位，但目前並沒有一部專門討論《名原》的著作，筆者蒐集前人的作品，發現各學者僅在文章中小幅地兼論《名原》一書的特色，即使有專文論及此書，亦太過簡略。《名原》一書所擷取的材料、研究的方法、釋字的正確性以及全書的體例、內容等諸多問題，筆者以為有綜合整理、分析探討的必要，希望從這次對《名原》的分析探討中能對《名原》一書的價值作一客觀的認定。又，研究古文字，首先需從「識字」開始，而識字又需以「方法」輔佐之，孫詒讓在古文字研究上即以善用研究方法為學者所認同，本論文的另一個目的，即希望在釐清《名原》的種種問題後，同時也能學習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步驟及方法，奠定良好的基礎，以作為日後學習古文字的基石。本論文分為三大部分：其一為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背景與環境；其二為《名原》一書校本與體例的分析；其三為《名原》一書內容的探討。本論文的研究思路是由外圍的環境背景探討，逐漸往核心發展。即從晚清古文字研究環境著手，確定孫詒讓所處的地位，進一步論述與《名原》關係密切的三部古文字著作，再進一步論及《名原》周邊的問題，如：校本、參考資料、體例等，最後探討其內容，確定其價值。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孫詒讓與晚清古文字研究	7
第一節 晚清的古文字研究	7
一、清代的金文學概況	9
二、孫詒讓與晚清金文的考釋	12
三、孫詒讓與晚清甲骨文的研究	16
第二節 孫詒讓的生平與著述	20
一、孫詒讓的生平傳略	20
二、孫詒讓著述簡譜	27
第三節 與《名原》關係密切的三部古文字專著	44
一、《古籀拾遺》	44
二、《古籀餘論》	51
三、《契文舉例》	54
第三章 《名原》的校本與體例	61
第一節 《名原》校本探析	61
一、校本流傳	61
二、傳圖本與戴本的比較	64
第二節 《名原》使用的參考資料	86
一、金 文	86
二、龜甲文	91
三、石鼓文	92
四、貴州紅巖古刻	94

第三節 《名原》的體例	98
一、釋名	98
二、撰作動機	98
三、各篇收字原則	99
四、體例	100
第四節 孫詒讓在《名原》中的文字觀	107
一、對文字起源的看法	107
二、對文字演變的看法	108
三、對六書的看法	109
四、對古文字作用的看法	112
五、對古文字通例、變例的認定	112
第五節 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方法	113
一、比較法	115
二、偏旁分析法	116
三、辭例推勘法	121
第四章 《名原》內容的探討	123
第一節 〈原始數名〉的探討	123
第二節 〈古章原象〉的探討	127
第三節 〈象形原始〉的探討	133
第四節 〈古籀撰異〉的探討	149
第五節 〈轉注揭橥〉的探討	155
第六節 〈奇字發微〉的探討	159
第七節 〈《說文》補闕〉的探討	164
第五章 結 論	169
引用書目	17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清代是古文字研究的鼎盛期，乾、嘉時期，金文著錄的著作不論是官方的、民間的，在歷代著錄金文的書籍中成為成績最豐富的時代〔註 1〕；到了晚清，甲骨文的發現，更提供古文字學家一片亟待開發的良田。而窮畢生心力在古文字學研究上的學者，首推晚清的孫詒讓。

孫詒讓窮四十多年的時間在研究青銅器銘文上，先後著有《古籀拾遺》、《古籀餘論》二部書。《古籀拾遺》撰寫目的在對宋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清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榮光的《筠清館金文》等書作糾謬的工作；《古籀餘論》則仿照《古籀拾遺》的體例，對清吳式芬《攔古錄金文》一書作糾謬的工作。這兩部書可以說是清代金文研究著作的總結。

光緒二十五年（1899），河南安陽發現甲骨卜辭，在短短的五年之中，劉鶚即編成《鐵雲藏龜》一書，以著錄甲骨拓片為主，也嘗試解釋幾個甲骨文字，次年，孫詒讓便根據《鐵雲藏龜》寫了《契文舉例》，這是第一部甲骨文研究的著作。

孫詒讓晚年，寫了《名原》一書，這部書雖然是孫詒讓最後一部古文字學的著作，卻是中國古文字學史上第一部綜合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古文字資料而成的著作，它所代表的意義，是正式結束歷代以「著錄金文並考釋文字」，亦即「以一器釋一器之文」的研究型態，而純粹以討論古文字字形為主的專著。

《名原》雖然在古文字學史上扮演著承先啓後的地位，但目前並沒有一部專門

〔註 1〕根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金石類》的登錄，金石類總錄的書約有二百三十多種；金文類的約有一百一十多種。在質與量上來說，都是較前代為勝的。

討論《名原》的著作，筆者蒐集前人的作品，發現各學者僅在文章中小篇幅地兼論《名原》一書的特色，即使有專文論及此書，亦太過簡略（詳第二節）。

《名原》一書所擷取的材料、研究的方法、釋字的正確性以及全書的體例、內容等諸多問題，筆者以為有綜合整理、分析探討的必要，希望從這次對《名原》的分析探討中能對此書的價值作一客觀的認定。

又，研究古文字，首先需從「識字」開始，而識字又需以「方法」輔佐之，孫詒讓在古文字研究上即以善用研究方法為學者所認同，本論文的另一個目的，即希望在釐清《名原》的種種問題後，同時也能學習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步驟及方法，奠定良好的基礎，以作為日後學習古文字的基石。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關於研究《名原》的論著（不包括通論介紹性的著作），計有：姜亮夫（寅清）的〈《名原》抉脈〉^{〔註2〕}；劉節的〈《名原》校證序〉；朱芳圃的〈《名原》述評〉、王更生先生《籀廬學記》中的〈《名原》與文字學〉、〈《名原》內容之分析〉；戴家祥先生的〈斟點《名原》書後〉；陳晔仁先生《孫詒讓的金文學》中的〈《名原》的金文研究方法〉等。除姜亮夫的〈《名原》抉脈〉筆者目前無法尋獲外，其餘的論著略述於下。

一、〈《名原》校證序〉、〈《名原》述評〉

一九六三年，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為慶祝孫詒讓一百五十歲的冥誕，由內部發行了《孫詒讓研究》論文集^{〔註3〕}，其中有兩篇關於《名原》的撰作，一為劉節的〈《名原》校證序〉，一為朱芳圃的〈《名原》述評〉。〈《名原》校證序〉的內容主要為作者敘述校勘《名原》一書後的感想，及對自己研讀金文，「每悟古文有字根、有語根，於其中尋求義例，偶亦有在籀翁創獲之外者」，藉此機會，質之同好，並紀念詒讓筭路藍縷之功。因此本文目的在於補闕與舉證，較少論及《名原》書中的種種。

〈名原述評〉為朱芳圃對《名原》一書作「依原書次第，逐一匡正」的工作，雖然朱氏依照詒讓原書的篇次論述，可惜的是文過簡略，多處只以「皆極精瑯」略

〔註2〕《國學商兌》，第1卷第1期，1933年6月。

〔註3〕《孫詒讓研究》由於是內部發行，此書特別罕見，卻又是研究孫氏大有助益的論文集。此書於1995年由現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橋本秀美先生寄贈林慶彰老師，黃智信同學向林老師借印此書時，因知筆者研究孫氏，特加印一冊相贈。於此感謝二位老師及智信同學的成全。

過，未能達其「逐一匡正」之旨。

二、《籀廬學記》

一九八三年，王更生先生在《籀廬學記》中分別有專章討論詒讓的甲骨學及金石學。另外，他在〈孫詒讓之文字學〉一章中，亦分別討論了「《名原》與文字學」、「《名原》內容之分析」兩個子題。先生認為《名原》的屬性為：

（一）《名原》為文字學中之字形學

他說：

先生曰：「今略摭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巖古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消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似此只著消變之原，以尋沿革之例，則《名原》實形書。質言之，亦即文字學中之字形學。

（二）《名原》為文字學中之歷史學

他說：

又後之學者治小學多本秦篆，以《說文解字》為攸歸，今仲容先生逆溯商周，考鏡金石，參之以《說文》古籀，而不受許氏《說文》之所局，故《名原》復為文字學中之歷史學。

（三）《名原》為文字學中之解剖學

他說：

文字演進之跡，雖可做歷史之追蹤，而字形分化之用，尤當作平面之剖解，今仲容考〈原始數名〉、〈古章原象〉，皆能類聚群分，據形繫聯，推本厥初，以究萬原，故《名原》更可為文字學中之解剖學。

對於《名原》一書的缺點，他說：

究以事屬初創，取材所限，居今日視之，其所正固仍不乏確鑿可據之說，而於精討博校之後，其間是非錯出者，更所在多有，綜而論之，其失有四：一則於六書中轉注之體認，尚欠精密；二則於甲骨文字之誤識，至同條之中，於文字形聲之分析，瑕瑜互見，使讀之者不易別擇；三則受許氏《說文》之影響過深，是以其間有不能以古文論古文，而暢所欲言之弊；四則本書為先生晚年力作，不徒老病催人，尤乏知者與。於增訂之役，至未能重校，即倉卒付諸梨棗，是以其中墨字紛陳，難以卒讀。

先生對於《名原》的研究內容豐富，條目清晰詳盡，但對於詒讓所誤釋的字（如：詒讓所說的甲文牛形實為犬形。）有部分的忽略。《名原》原書墨丁過多，但有校本

問世，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容庚補墨丁、程雨蒼逐錄的校本，先生皆未參考。

三、〈斟點《名原》書後〉

一九八六年，戴家祥先生在斟點完《名原》一書後，寫了〈斟點《名原》書後〉一文，文中說明《名原》的流傳情形，以及他的校勘結果，並歸納出原本《名原》所出現的錯誤有：「稱引鐘鼎彝器器名之譌」、「引用《說文》失檢」、「空白待補」、「空白譌贖」、「文字俱倒」、「譌衍」、「譌奪」、「聲近而譌」、「形體譌別者多至二百多處」、「不明致譌之由」等。全書約計四萬五千七百餘字，連同墨丁，就有六百六十餘處需或補、或刪、或修。戴氏的斟點工作雖有漏失（如錯字未出校、標點錯誤等），但整體而言，對研究孫詒讓古文字的學者，是助益匪淺的。

四、《孫詒讓的金文學》

一九九六年七月，由孔德成先生指導，臺灣大學中研所碩士生陳暉仁先生撰寫的畢業論文《孫詒讓的金文學》，是一部專以孫詒讓的古文字學為題的專著。此書重點在於分析《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的寫作動機、選用材料以及這兩部書的成書及流傳情形、價值。另外，他也有專節討論《名原》的金文研究方法。

本書作者對資料的分析詳盡，亦能從分析中提出個人的論點，但詒讓對於古文字字例的分析，本書較少提及。關於此點，作者在〈緒論〉中說：

孫詒讓的金文研究成就，前人多稱及之，相對於一字一辭的考釋成果，孫詒讓的研究方法與態度，應當更為重要，然而民國以後的孫詒讓研究，常拘於字句考釋之是與非，而鮮有論及孫詒讓之金文研究方法。〔註4〕

又說：

……希望闡明孫詒讓金文研究的方法與態度，並不欲斤斤計較於字辭之考釋。〔註5〕

然筆者以為，研究方法的優劣，端賴對字辭考釋的正確與否，詒讓之所以為人所稱道，主要是因他正確考證出許多古文字，使後來的學者對其所善用的「偏旁分析法」加以肯定。因此，研究方法與文字考釋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而非可以分別論之。

另外，詒讓研究金文的方法，除了「偏旁分析的概念」、「辭例推勘的運用」外，「比較法」應是詒讓最常用的方法，這點本書作者並未注意到。

〔註4〕陳暉仁撰：《孫詒讓的金文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頁13。

〔註5〕同前注。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全文提要

本論文分爲三大部分：其一爲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背景與環境；其二爲《名原》一書校本與體例的分析；其三爲《名原》一書內容的探討。

在「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背景與環境」這部分中，分爲三小節，其一爲「晚清的金文學概況」，此節利用歷史文獻分析法將晚清金文研究的環境作分析，從中認識孫詒讓在此環境所處的地位。又，當時適逢甲骨刻辭的出土，因此在此節亦附帶論及甲骨文字的研究與孫詒讓的關係。其二爲「孫詒讓的生平與著述」，此節亦利用文獻的分析與歸納，爲孫詒讓作傳略，由於孫詒讓的生平已有專著論述〔註6〕，更有學者爲其編纂年譜〔註7〕，且本論文的重點不在孫詒讓的生平，此處僅作重點探析。惟近年來大陸溫州圖書館、杭州大學將孫詒讓的遺文陸續作整理、發表，因此筆者將所能蒐集到的資料，爲孫詒讓編「著述簡譜」，置於其傳略後。其三爲「與《名原》關係密切的三部古文字著作」，此節分析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三部書，歸納其體例，分析其內容，整合其傳本，從而得知《名原》脫胎於此三部書。

在「《名原》一書校本與體例的分析」中，分爲五小節，其一爲「《名原》校本探析」，《名原》原書因刊於孫詒讓身後，故其中有許多因刻工不識爲何字而產生的墨丁，此處以孫詒讓的自刻本爲底本，進行不同校本的比對，以觀學者補墨丁的差異。其二爲「《名原》使用的參考資料」，針對此書所使用的參考資料作分析。其三爲「《名原》的體例」，先將《名原》一書的解說分爲釋形、釋音、釋義三部分，再針對各部分作分析，最後歸納其體例。其四爲「孫詒讓在《名原》中的文字觀」，由書中的說解，歸納孫詒讓對古文字的起源、作用、與六書的看法，以及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通例」及「變例」。其五爲「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方法」，由鳩合孫詒讓釋字的關鍵語如「偏旁」、「以文義推之」、「核之甲文、金文」等，而得出孫詒讓研究古文字的方法。

在「《名原》一書內容的探討」中，依循孫詒讓《名原》針對不同主題的立論而分爲七小節，此處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孫詒讓釋字的準確性，因此，在字例的取捨上，以孫詒讓釋錯的字爲優先考量，列出孫詒讓的解說，指出其錯處，並引用其他學者考釋正確的說法以證其誤。對於引用學者說法的標準，首列第一個釋出正確

〔註6〕如陳振風撰：《孫詒讓之生平與學術思想》（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年6月），189面，何佑森指導。

〔註7〕目前臺灣可見最完整的孫詒讓年譜爲朱芳圃編：《清孫仲容先生詒讓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6月），101面。

字的學者的說法，次列異說而值得參考者，最後列總結前說者。因重點在瞭解孫詒讓釋字的準確性，不在後代學者的論爭，因此不將各家說法一一列出。

歸結以上分析，本論文的研究思路是由外圍的環境背景探討，逐漸往核心發展。即從晚清古文字研究環境著手，確定孫詒讓所處的地位，進一步論述與《名原》關係密切的三部古文字著作，再進一步論及《名原》周邊的問題，如：校本、參考資料、體例等，最後探討其內容，確定其價值。

第二章 孫詒讓與晚清的古文字研究

第一節 晚清的古文字研究

在甲骨文尚未發現之前，學者所謂的古文字指的是彝器上的銘文，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給古文字指出了一個範圍，他說：

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註1〕

又說：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葉16左）

又說：

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葉18左）

又說：

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葉24右）

可見《說文》中的古文字主要來源有二：一為孔壁中古書上的文字，二為前代鼎彝上的文字。彝器上的銘文，漢代很少人能識讀，第一個利用古彝器來證史事的人是西漢的張敞，《漢書·郊祀志》說：

是時（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豳，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邠，文武興於鄴鎬。由此言之，

〔註1〕（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敘》，《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年12月），卷15上，葉9右。

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註2〕

張敞「好古文」，一方面是個人的興趣，另一方面，他更受過古文的訓練，《說文·敘》說：「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卷15上，葉13左）《倉頡》中多古字，漢代的學者多不能讀通，因此漢宣帝便廣徵能讀通《倉頡》的人，由張敞從此人學古字。雖然張敞對古文字的研究能力頗高，但在有漢一代，並未造成風尚。〔註3〕

到了唐初，發現秦代石鼓，但朝廷並未認識它的價值，任其散置荒郊，直到宋代才將這批石鼓由鳳陽遷到京師，置於太和堂陳列。王國維在《宋代金文著錄表》中說明這個原因：「古器物之出，蓋無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於郡國山川者雖頗見於史，然以識者少而記之者復不詳，故其文之略存於今者，唯美陽與仲山甫二鼎而已。」〔註4〕

宋代研究銘文最早在咸平三年（1000），《宋史·句中正傳》記載：

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

又說：

（宋真宗咸平三年）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註5〕

這件事在翟耆年的《籀史》中亦有記載，〈周秦古器銘碑〉中說：

咸平三年五月，同州民湯善德于河濱獲方甗一，上有十二字；九月，好時令黃傳鄆獲方甗一，銘二十一字，詣闕以獻，昭示直昭文館句中正、秘閣校理杜鎬。中正識其刻書，以隸古文訓之，少者八字，多者七十餘字。〔註6〕

〔註2〕（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郊祀志》（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9月），卷25下，頁1251。

〔註3〕其原因在於「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參見《說文解字·敘》，葉19右。

〔註4〕王國維撰：《宋代金文著錄表》，《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8月）。

〔註5〕（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卷441，列傳第200，文苑三，頁13049～13050。

〔註6〕（宋）翟耆年撰：《籀史》，《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7月），

而呂大臨的《考古圖》將二十一字方甗命名為〈仲信父方旅甗〉，並將此器銘、形制、來源作了考證：

惟六月初吉，~~支~~仲~~錫~~信父作旅甗，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右得於好時令。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八寸有半，衡尺有二寸，自唇至隔底，深八寸四分，四足皆中空，甗容六斗四升，足容斗有六升。

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好時令黃傳鄆獲是器，詣闕以獻，詔句中正、杜鎬詳其文。惟~~支~~字，楊南仲謂不必讀為史，當為中，音仲。（註7）

由於受到皇帝的重視，又配合著青銅器的出土越來越多，使得宋代研究、著錄銘文的人也隨之而盛。

宋代著錄金文的書有三十多種，近人王國維根據宋代存留的著作統計，著錄的古銅器有六四三件，其中疑為偽器的有十九件，秦漢以後的有六十件，夏、商、周三代的有五六四件（註8），這是一個不小的數量。而流傳至今，仍為後代的文字學家所常引用的著作有：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的《宣和博古圖》、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王俅的《嘯堂集古錄》等。王國維認為自乾嘉以後，金石學研究盛行，一般學者對宋代的研究頗為不屑，但《考古》、《博古》二圖對於摹寫、形制、考訂名物乃至於出土地、藏器家，只要能考證得到的，無不畢記，並謂：「後世著錄家當奉為準則。」這是王國維對宋代金文學者的肯定。

元明兩代，前者蒙古人入主中原，文化不興；後者理學盛行，論道者眾。一般收藏家雖然也注重這些古器物，但是他們把重點放在古董收藏，並不太在意銘文在學術上的價值。使得古文字無法以宋代的成果為基礎，做更進一步的研究。這是清代以前古文字研究的一個概況。

所謂的「古文字」，嚴格說來，應該包括商代、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甲骨文字、青銅文字、石刻文字、璽印文字、玉器文字、貨幣文字、陶器文字、簡牘文字、縑帛文字、漆器文字等。但這一節所討論的「古文字」研究，重點放在甲骨、青銅文字上，因為孫詒讓的古文字研究範圍大致在這兩方面。而清代的古文字研究，是以青銅文字為主，甲骨文的研究一直要到光緒二十五年發現甲骨以後，陸續才有學者研究。本節的目的即在呈現孫詒讓在古文字研究環境中扮演的角色。

一、清代的金文學概況

第3輯，冊40，頁719。

（註7）（宋）呂大臨撰：《考古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9月），頁子77～638。

（註8）王國維撰：《宋代金文著錄表》，《王國維遺書》第三冊。

清代是金文學研究的鼎盛期，許多小學家繼承許學的傳統，對一切可以印證經籍，辯證歷史，解說文字的資料都極度重視。孫詒讓在《古籀拾遺·敘》中說：

考讀金文之學，蓋萌祗於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述李愷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註9〕，此以金文說字之始。誠以制器爲銘，九能之選，詞誼瑋奧，同符經藝。至其文字，則又上原倉籀，旁通雅故，博稽精斟，爲益無方。然則宋元以後最錄款識之書，雖復小學支流，抑亦秦漢經師之家法與？〔註10〕

用金文「證經」、「說字」是漢代經師的家法，用金文等古文字來說解文字，是文字學家的傳統。這是因爲漢字的結構與演變有一定的規律，只有依據這些早期的文字資料，才能得出與事實相符合的結論。許慎在他的《說文解字》中所收錄的古文、籀文、奇字等，都可說是古文字的一支，沒有了這些資料，他是沒有辦法做出準確的推測與結論，也不會被歷代的學者所不斷的徵引及研究。但是《說文》中的古文字及孔子壁中所發現的古文經書，在歷代傳寫的過程中多有訛誤，想要準確的運用這些資料，必定要經過與出土古器物銘文的相互對照，才能得到較完整的結論。這就是歷來漢學家重視金石文字的緣由。

清代對銅器的蒐集整理，比起宋代要興盛得多。這主要是由於如上所說小學家治學的目的在於通經考史，經世致用，誠如阮元所說青銅器銘文「其重與九經同之」〔註11〕，青銅器銘文自然要被視爲重要的史料。同時，清代的銅器比宋代有更豐富的發現，爲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乾隆十四年（1749），敕命梁詩正等人仿宋代《宣和博古圖》的體例，將清廷內府收藏的古代銅器，編爲《西清古鑒》四十卷，〔註12〕歷十六年而成。乾隆四

〔註9〕許慎雖於《說文·敘》中說：「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但在《說文》中並未如詒讓所說許慎利用銅器銘文以修古文，比較可能的情況是許慎確實看到這些出土的青銅器，可是當時出土的青銅器並不多，許慎無法廣泛利用。如果他利用青銅器以證字，行文中應有「某某器作某」的字樣，然觀《說文》，並未發現有此例。

〔註10〕（清）孫詒讓撰：〈古籀拾遺·敘〉，《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9月），頁1。

〔註11〕（清）阮元撰：〈商周銅器說·上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百部叢書集成（文選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頁3。

〔註12〕全書收商周至唐代銅器1436件。鏡93面。每卷先列器目，每器繪其圖像，記其大小尺寸、重量、摹寫銘文並加以考釋。此書收說雖富，且摹寫尚精，但銘文縮小，多有失真，所收偽器幾至十之三四，書中見解陳舊，多不足取。（姚孝遂主編，董蓮池撰：第六章〈文字學的興盛期——清代的文字學〉，《中國文字學史》，吉林：吉林

十四年（1779）再敕命編成《寧壽鑒古》十六卷，〔註 13〕體例與《西清古鑒》相同。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敕命王杰等編《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到乾隆五十八年（1783）成書，同時又編成《西清續鑒乙編》。〔註 14〕以上四書即所謂的「西清四鑒」。共收錄清內府所藏青銅器四千餘件，比起宋代所收錄的銅器，多了大約四倍左右。胡樸安以爲這四部書「考釋不甚精確，只可爲研究金文學者參考之助」。〔註 15〕董蓮池則認爲：「這四部書雖然僞器過多，說解陳陋，摹寫每有失真，但卻是金石學史上的一次壯舉。〔註 16〕」因爲朝廷帶動了私人收藏家的興趣，私人著錄的書也相繼問世。王國維在《國朝金文著錄表·序》說：

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於宋而中衰於元、明，我朝開國百年之間，海內承平，文化溥洽。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爲《西清古鑒》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求古器，蒐集拓本，其集諸家器爲專書者，則始於阮文達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而莫富於吳子苾閣學之《攔古錄金文》。〔註 17〕

這一時期著錄銅器銘文的書籍，主要有兩類：一是仿照宋代《考古圖》的體例，以記錄銅器圖形爲主，並附上銘文和考釋。上述由官府所編的四部書即是此類。屬於這一類型的私人著作有：

時 代	編撰者	書 名	卷/冊數	藏器數
嘉慶六年	錢 坫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	四 卷	49
道光十九年	曹載奎	懷米山房吉金圖	一 卷	60
同治十一年	吳 雲	兩壘軒彝器圖釋	十二卷	110
同治十一年	潘祖蔭	攀古樓彝器款識	二 卷	50
光緒十一年	吳大澂	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不分卷 二 冊	136
光緒三十四年	端 方	陶齋吉金錄	八 卷	148
宣統元年	端 方	陶齋吉金續錄	二 卷	21

教育出版社），頁 316～317。

〔註 13〕共收清內府所藏銅器 600 件，及銅鏡 101 面。（同上注，頁 317。）

〔註 14〕《甲編》收商周青銅器 844 件，鏡 100 面，雜器 31 件；《乙編》收商周青銅器 798 件，鏡 100 面。二書皆縮小銘文，記有重量，有釋文或簡單說解。（同上注，頁 317。）

〔註 15〕胡樸安撰：〈古文字學時期〉，《中國文字學史》第四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9 月），頁 601。

〔註 16〕同注 8，頁 317。

〔註 17〕王國維撰：〈國朝金文著錄表·序〉，頁 1。